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在本期雜誌出版之際，正值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由於新冠疫情較前明顯放緩，不同的慶祝活動陸續舉行，彷彿為沉寂多時的「東方之珠」重新燃起亮光。在後疫情時代，國際環境變幻莫測，新一屆特區政府將會如何應對未來的管治挑戰？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刊出的幾篇評論文章，或可作為我們思考的起點。

——編者

中越關係中的邊界問題

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互動中，中越關係起伏最為劇烈，從意識形態盟友演變為兵戎相見的敵手，背後的根源困擾着國內外學界，現有研究主要結合1949年以來中國援越抗法抗美的進程出發，指出中越分歧如何逐步擴大。學者總結認為，對古代中越關係的不同解讀（是郡縣時代還是北屬時期）、「中國模式」輸出造成的負面影響、路線分歧、蘇聯因素、紅色高棉問題等導致中越關係的惡化。一些學者雖已論及邊界爭端，但主要根據西方的觀察，而非基於史料的嚴肅探討。因此，游覽〈戰後中越

陸地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及再思考〉（《二十一世紀》2022年4月號）一文利用中國檔案史料，從中國視角重新思考中越邊界問題，突破現有研究存在的若干瓶頸。

游文將中越邊界問題置於中國處理與周邊鄰國邊界問題的大框架下進行考察，清晰描述了中越邊界爭端之始，探討了雙方解決邊界問題的戰略思考。全文的觀點表述中肯，可以提煉出這樣一個結論：伴隨着中越之間的路線分歧和對蘇態度差異的顯現，邊界問題從1970年代之初開始對雙邊關係產生負面影響，逐漸趕上甚至超過連結中越的積極因素。不過，文章最值得讚許的是使用了不少內部參考資料，並夾雜小部分檔案。須知在中國檔案管理嚴格的大環境下，大多數學者是難以獲取這類史料的。

鑒於游文兼談了陸海邊界問題，或許值得學界共同思考的是，越南領導人如何轉而天經地義地相信自己的南海主權訴求？他們又如何向內部系統地灌輸這一觀點？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前者回應的是決策者對南海島礁的深層次思考，後者反映的是低層級政治

立場的形塑。游文觸及了某些部分，但未能展現越南高層的思維方式。當然，這些批評可能顯得過於苛責，因為超出了作者擬解決問題的範疇，更重要的是由於有價值的越南資料相當少見。筆者想起了劉文利所撰、1990年由越南人民公安出版社印發，被列為越南幹部必讀的內部資料《越南：陸地、海洋、天空》，建議作者不妨參考。

舒全智 廣州

2022.4.25

中老邊界背後的中蘇越老四方關係演變

領土邊界問題事關國家利益，是國與國之間高度敏感的問題，歷史上領土邊界引發的衝突和戰爭不勝枚舉。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擴張，變更殖民地邊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興國家間的領土糾紛埋下了種子，中國與鄰國的邊界糾紛也大都是殖民主義的遺留。中國有十四個陸上鄰國，除印度和不丹外，中國與其他十二國的陸地領土邊界已劃定。其中，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具有獨特性，因為其涉及到明確的第三方——越南。馮一鳴的文章〈中越關係嬗變與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1971-1992）〉（《二十一世紀》2022年4月號）較好地梳理了中越關係的嬗變對中老邊界問題的影響，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首先，文章提供了新的視角、還原了重要史實。以往研

究邊界問題的論著大都著墨雙邊關係，至多論述一點大範圍的國際背景，如對中印邊界問題的研究。馮文則指出了第三方越南的影響，在中、越、老三邊關係結構中論述中老邊界問題，無疑拓展了論述深度和力度，也為我們理解和觀察中老關係的其他方面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框架。其次，文章雖以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為主題，卻呈現了一幅較為完整的中、蘇、越、老四方關係演變圖景。自1960年代以降，四方關係逐漸演變成以中國為一方，以蘇、越、老為另一方的敵對關係，中老邊界問題也隨之出現，中老邊界愈來愈被中國視為蘇聯企圖在印支包圍中國的一環。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着中蘇關係正常化、中越關係轉暖，中老邊界問題隨之解決。此外，文章運用中、蘇、柬、越多國文獻史料，為繼續研究相關問題提供了難能可貴的線索。

當然，文章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和進一步完善之處。首先，作者將大量篇幅放在中、蘇、越、老四方關係的演變上，很多地方對中老邊界只是一筆帶過，只有在第三部分第三小節集中論述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而這一小節又與前面的內容在銜接上顯得很突兀，使文章主題有所削弱。其次，正文第一和第二部分在內容上有所脫節。第一部分集中論述1965年前的四方關係，第二部分卻又從1970年代蘇聯的印支政策講起，中間缺乏1965年後北越逐步接近蘇聯、老撾徹底

倒向北越這一過程，不免給缺乏背景知識的讀者造成閱讀障礙。再者，對某些材料的使用、解讀和細節的把握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如作者提到「鑒於越方〔反修〕態度愈加明朗，中共遂在1963年底同意越南黨增兵入老作戰」，這與事實不符。中國在1963年4月就積極推動越軍入老作戰，當時是北越不積極。再如，對越作戰行動到底是應對來自蘇聯的安全威脅還是「反霸」，文章未有界定清楚。最後，若能對老撾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有所論述，文章會更有意義。

時偉通 北京

2022.5.3

所謂「牢不可破的血盟關係」是否鐵板一塊？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正式參與抗美援朝作戰。直至1953年7月停戰協議的簽訂，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達到了既定的戰略目標，並以鮮血與朝鮮人民結下友誼。然而，這看似「牢不可破的血盟關係」的內部並非風平浪靜，甚至在關係形成的初期便充滿種種尖銳的矛盾。謝定元〈「先軍事後財經」：中國對朝鐵路援助探析（1950-1955）〉（《二十一世紀》2022年4月號）一文，聚焦戰爭期間中朝雙方圍繞朝鮮鐵路的管轄權發生的激烈衝突，向讀者提供了一個一窺這不平凡歷史的視角。

得益於作者強大的史料搜集能力，文章得以運用多國的一手史料進行詳細的論述。其中《劉居英抗美援朝時期文件》

與《抗美援朝戰爭後勤經驗總結：資料選編》等文獻尤為珍貴，為本文增添了不少細節與說服力。在龐大詳實的一手資料基礎上，作者帶着明確的問題意識對材料進行充分的解讀，闡明以下幾個問題：首先，中國之所以對朝鮮提供大規模的鐵路援助，不僅僅是因為朝鮮鐵路具有重大的經濟、軍事意義，其作為構成東北亞交通大動脈的重要一環，重大的地緣戰略價值更是中國提供援助的一大考量因素。其次，中國堅持對朝鮮鐵路進行軍管主要是出於對作戰需求的考量，而不是為了通過控制鐵路從而進一步干涉朝鮮內政。特別是戰爭初期，當雙方圍繞鐵路管轄權的糾紛嚴重拖累到戰事時，中方更是堅定了軍管的立場。朝鮮之所以一開始不配合中方對鐵路的軍管，並不是單純地為了爭奪管轄權，而是出於被中國全面控制的擔憂。再次，中國對朝鐵路援助為中朝軍隊作戰提供了生命線，還保障了朝鮮戰時國民經濟的基本運行，並推動了戰後的重建工作。

文章的一大亮點是對於中國對朝鐵路援助之歷史過程的梳理。這不僅彌補了該領域的空白，還對已有文獻的觀點起到補充作用。或許是受限於史料的內容，抑或是文章篇幅的限制，文中有關中朝衝突的部分讀起來多少讓人感覺意猶未盡，特別是蘇聯發揮了何種角色並沒有被充分體現出來。作者如能從社會主義陣營內部角力的角度來描述這段歷史的話，論述將更具有張力，文章也會更具有可讀性。

尹博堯 首爾

2022.5.3